

世界

百年

第一辑

1901-1950

风云纪实
(1930)

青

少

年

必

知

文

库

孙广来 /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必知文库

世界百年风云纪实

第一辑
1901 - 1950
(1930 年)

孙广来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百年风云纪实,第1辑/孙广来主编,一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04-08582-5

I. 世... II. 孙... III. 世界史:现代史—大事记—1901
~1950 IV.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311 号

世界百年风云纪实

(第一辑)

孙广来 主编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山羽设计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25
字 数	3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套)
书 号	ISBN 7-204-08582-5/K · 496
定 价	990.00 元 (全五十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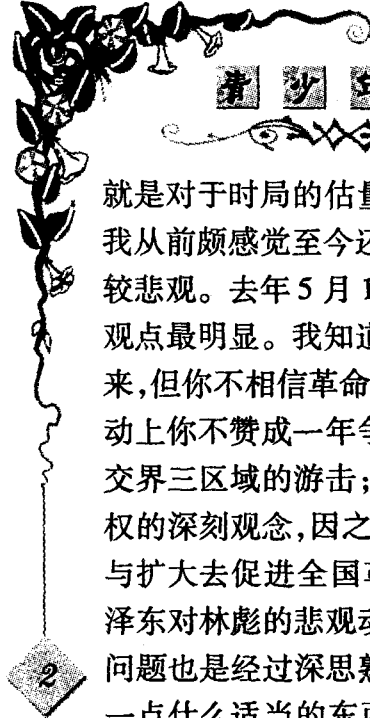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名著的发表	(1)
“杨格计划”的制订	(6)
富农阶级在苏联消灭	(9)
海军会议在伦敦召开	(13)
“印度独立日”的形成	(15)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	(19)
龙州起义的爆发	(22)
胡志明领导成立越南共产党	(26)
越南国民党发动的安沛起义	(30)
“左联”的成立	(31)
越南义静九月风暴	(35)
印度的“食盐进军”	(39)
规模空前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43)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谜	(45)
印度非暴力运动难以实现	(51)
蒋、冯、阎中原大战	(53)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59)
《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	(64)
联共(布)十六大举行	(67)
福建南阳会议的召开	(73)
首届世界杯赛举行	(76)
邓演达成立国民党临时会	(80)
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在上海成立	(85)
纳粹党在德国国会选举获胜	(87)
威海卫结束殖民历史	(90)
台湾雾社起义爆发	(91)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获胜	(93)
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	(96)
法国爆发经济大危机	(98)
全国建成一批高等院校	(101)
工人运动席卷拉美大陆	(104)
英科学家发现中子	(106)
美国刘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08)
日寇叫嚷“满蒙危机”	(109)
毛泽东受挫折	(118)
列宾与“学院暴动”	(124)
中国红军第一次空中出击	(129)
“克鲁白”山炮的战功	(13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名著的发表

红军在成立之初,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困中艰难发展的。在敌人频繁的“会剿”和围困中,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特别是个别党的高级干部也表现出右倾悲观思想。在古田会议召开的前夕,当时任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竟然主张把红四军分散开来打游击,公开表露了他的右倾思想。由于当时正忙于筹备召开古田会议,而后又忙于部署对付敌人的“三省会剿”,毛泽东没有立即回复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已结束,红军部署也已完毕,毛泽东对当时革命斗争中的重要问题也已考虑成熟,于是就时局和革命的性质、前途问题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毛泽东不但批判了党内林彪等人的右倾悲观思想,主要是深刻地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伟大理论。这篇文章也标志着毛泽东的“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形成。

信中毛泽东写道:“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这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悲观动摇是早有察觉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毛泽东认为林彪的这种思想根源于:“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总结了井冈山、赣南和闽西斗争经验,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其中心内容有如下四点:

首先,他指出,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它们支持各派军阀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压迫剥削。为了各自的利益,各派反动军阀之间必然要进行激烈的争夺,于是出现连年混战的局面。这就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一方面,军阀混战都以城市为中心,从而使革命力量不可能在城市中立足;另一方面,广大农村成为反动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给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发展存留了空间,从而产生了“一件怪事”,“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了“城市中心”论,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其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他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也说明了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第三,他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发展决定了中

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作了精辟的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地混战，中国各派反对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

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工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第四,他指出,红色政权的建立是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并对中国革命具有远大的意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題,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敌人所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条件下的革命发展规

律。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杨格计划”的制订

1930年1月20日,海牙会议通过了“杨格计划”。这一“计划”主要是解决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和协约国从莱茵区撤军问题。在1924年,曾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它仅仅规定了德国每年的赔款数额,对赔偿的总额和偿付年限都未加限制,因此没能彻底解决德国赔款问题。从而,制定新的赔款计划的需要就成为必要了。

制定新赔款计划的要求首先来自德国。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的经济逐步恢复起来,1927年工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1929年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与此同时,德国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改善,参与签署《洛迦诺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并加入了国联。随之,德国谋求修改“道威斯计划”。

德国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美国是德国的主要债权国。1924年至1929年德国工业投资630亿马克,其中300多亿马克为外国贷款,而外国贷款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希望德国经济稳定,支持德国的要求,但反

对把赔款问题同战债问题联系起来。英国同意重新考虑赔款问题,条件是必须减免战债,若美国不减免战债,英国从德国索取的赔款就不得少于它向美国偿还的战债。法国和意大利的观点同英国相似。1928年10月中旬,德国签订在新计划下款付的赔偿将足以使协约国偿债,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诺解除协约国对莱茵河左岸的占领。这样,德国赔款问题才被提上日程。

12月底,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德国就建立专家委员会一事达成协议,并决定吸收美国专家参加专家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拟定关于德国赔款问题完整的和最终的解决办法。“道威斯计划”的制定者之一、美国摩根财团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欧文·杨格被任命为专家委员会主席。

1929年2月,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始工作。德国代表沙赫特提出,德国无力每年支付25亿马克,要求削减偿付数额。美国对此表示支持,但遭到法国和比利时的反对。于是,杨格建议削减英国应得的赔款份额,用以增加法、比、意所得份额。经过几个月的争论,6月7日,杨格委员会制定出德国赔款问题的新方案,即“杨格计划”。其主要内容是:(1)赔款总额为1139亿马克。(2)赔偿期限为59年,分2个阶段。自1929

年9月1日至1966年3月31日,平均每年偿付赔款19.88亿马克,此后22年中,每年的赔偿数额等于协约国每年向美国偿还战债的数额。(3)赔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不能延期支付,另一部分在德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可延期支付,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4)由美、英、法等国组成国际清算银行,以代替根据“道威斯计划”而设立的赔偿委员会及其他机构。该银行行使征收和分配赔款的职能,并在德国经济不景气时提供援助。(5)赔款来源于德国铁路收入和国家预算。(6)赔款兑换为外汇的责任,改由德国政府负责。

“杨格计划”减轻了德国的赔款负担,取消了对德国的财政管制,有利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1929年8月6日,讨论“杨格计划”的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与会国共12个,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葡萄牙。会议设财政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前者讨论德国赔款问题,后者讨论协约国从莱茵区撤军问题。在财政委员会会议上,英国财政大臣斯诺登建议重新研究杨格计划规定的赔款分配方案,反对削减英国获得的赔款数额,法国则主张完全接受“杨格计划”。英国拒不让步,法国只好考虑英国的要

求。与此同时,政治委员会就提前从莱茵区撤军达成协议,规定英、法、比军队自1929年9月至1930年6月从莱茵区全部撤出。1929年8月31日,与会各国签署一项议定书,原则上同意“杨格计划”。1930年1月20日,海牙会议举行签字仪式,正式批准“杨格计划”。

富农阶级在苏联消灭

1930年1月20日,联共(布)中伏尔加边区委员会就通过决议,要求在2月5日以前消灭反苏维埃政权的富农活动分子;2月5—15日完成驱逐属于第二类富农1万户的任务。为了贯彻边区党委的这项决议,在各州和各区的党委会下面设立“战斗司令部”,以指挥消灭富农阶级的“战斗”行动。其他地区的党委会也都通过了消灭富农阶级的类似决议。

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发表《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说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

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呢？斯大林回答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斯大林的讲话是对能不能让富农参加集体农庄问题讨论的最终裁决，标志着从限制和排挤富农阶级政策到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急剧转变。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最新讲话的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月30日，政治局用电报将决议发给各地党组织。决议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废除关于租佃土地、使用雇佣劳动等法律，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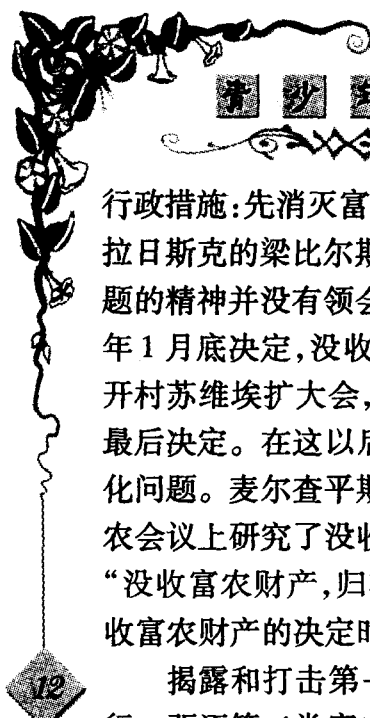
牲畜、经营用建筑物、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子储备等等。

决议关于具体处置富农的规定是：1. 反革命富农的活动分子、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属于第一类，应立即逮捕，押入劳改营，其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应处以极刑；2. 反对集体化运动的大富农、从前的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当从全盘集体化地区搬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及北方地区；3. 把大多数属于第三类的富农户分别迁到本地区专门划出来的、在集体农庄以外的地段。

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又做出《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做斗争》的决议，从立法程序上确认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用电报发给各地苏维埃政府。指令估计：第一类富农为6万多户；第二类富农为15万户；第三类富农约80万户。

于是，对富农阶级实行“扫地出门”的消灭措施，在全国掀起一场暴风骤雨般地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而且都把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



行政措施：先消灭富农阶级，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萨拉日斯基的梁比尔斯克村苏维埃对农村全盘集体化问题的精神并没有领会，可是村苏维埃主席团就在1930年1月底决定，没收本村8户富农的财产。2月初召开村苏维埃扩大会，就没收这8户富农财产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在这以后，才在全村大会上提出全盘集体化问题。麦尔查平斯克村苏维埃也是先在小范围的贫农会议上研究了没收富农财产问题，并立即做出决定：“没收富农财产，归将来的集体农庄所有。”当做出没收富农财产的决定时，全盘集体化尚未着手进行。

12

揭露和打击第一类富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执行。驱逐第二类富农由所在的村苏维埃提出名单，由所在的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并委托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执行没收富农财产的义务。安顿第三类富农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确定。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在4个月内再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的负责工作者下乡。

1930年春天，在西伯利亚有51900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9000户；在北高加索有39700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8400户；在伏尔加河中游有28000户富农被剥夺财